

**官立中学堂——天津市第三中学  
校 志**

1901—2001

天津市第三中学校史编辑委员会

---

# 上 编

( 1901. 3—1949. 1 )

---



# 第一章 官立中学堂—— 天津市第三中学的创建 (1901.1 - 1903.2)

## 第一节 原址沿革及其文化底蕴

官立中学堂——天津市第三中学是全市最早建立的一所官立中学。其前身叫普通学堂,创建于清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十九日(1901.3.9),迄今已逾百年。已经有32000多学生从这所学校毕业。在这所中学的地址上曾建有一座稽古寺和一座藏经阁,还曾连接有一座海会寺。

### 一、稽古寺 藏经阁 海会寺

稽古寺为明万历七年(1579)建造,地址在天津城北不远的地方。寺内南面是大殿,供奉着关羽塑像。旁为藏经阁。

藏经阁历史更为久远,据传说建于唐代,另说建于元代。清康熙三十八年(1699)由天津道捐资重建,请来浙江高明工匠,仿照武昌黄鹤楼建造。阁两层,宽五楹,阁的基础是在最高的地势上又突起了八九尺,形成了巍然耸立的气势。全阁雕梁画栋,飞檐从四面分出,像一隻硕

大的飞鸟张开巨翅,颇为壮观。在各个房椽的尽头都悬挂着一尺多长的铜铃,铃的数目很多,不下千百个。每当有风吹来,铃声先后急徐,参差不断,就像或大或小的波浪送入耳鼓,非常悦耳。如果有兴致还可以登临阁上或俯瞰、或远瞩,南运河上舟船往来及两岸商贩行人形形色色的动态尽入眼帘。藏经阁因有众多铃铛的妙处被称为铃铛阁,声名远播,成为代表天津形象的标帜,与鼓楼、炮台并称为天津卫三宗宝,是三宝中历史最久的一宝。在天津内外传诵了二三百年来,人人皆知。许多文人学士登临吟诵,文学家朱彝尊登阁后写过一篇《天津卫稽古寺重修藏经阁记》,诗人汪沆有诗云:" 骏馱高阁接青冥,甲乙签排贝叶经,静依阑干看落照,忽闻天半响风铃"。樊彬,华鼎元等不少人也有吟咏铃铛阁的诗作。从铃铛阁向西,不过二三里就到了乾隆曾四次" 驻蹕"、天下文人争先观赏,逗留其间,挥毫泼墨,吟诗绘画,撰文题字的水西庄(也叫芥园)。铃铛阁和水西庄相互辉映,形成当时天津的一个游憩的胜境,焕发出浓重的文化氛围。

藏经阁藏佛经十六柜,内大藏经一部是元朝皇帝所颁赠,版本上乘。清乾隆、嘉庆年间,阁内增设藏书楼,藏有社会名流捐赠的珍贵书籍,海内外孤本,其中有六朝手写经卷40余卷,元明两代手抄本100多卷,属稀世珍品。可惜光绪十八年(1892)年一场大火,使藏经阁及所藏经卷典籍全部焚毁,无一幸免。但铃铛阁的名气还继续留传下来,门前的一条街一直称为铃铛阁大街。现在虽因开通芥园西道干线,铃铛阁大街部分被拆除,但仍有部分

保留。

海会寺在稽古寺西面,元至正(1341—1368)年间由天竺国僧人海会所建。元帝颁赠大藏经一部,分装于16柜,先藏于寺,后建阁保存。明朝末年海会寺坍塌,寺址及藏经阁均并入稽古寺。

## 二、稽古书院及其周围环境

光绪十三年(1887)稽古寺的住持僧人沙园、普泽先后变卖和典当庙产,挥霍胡为,携款潜逃。天津知府汪守正遂决意废庙办学,与邑绅崔铨,杨云章等十余人共同将稽古寺改为稽古书院。

稽古书院和有些书院专为科举作准备的不同,不学八股文,不为科举作准备,而是比较广泛地学经书、古文、诗赋等旧学。汪守正对书院很热心,为解决书院所需经费问题,率先捐银1000两,在他的带动下,其他官员有捐500两的,有捐一二百两的,也有捐十两银子的,量力捐助,共捐助约三千两银子。又从田产地租,商业赢余拨给部分钱款。还带头为生员讲课,其他官署的主官也随他轮流讲课。有时还对学员出题考试,择优给奖,鼓励了这一方青年求学读书的风气。

书院地近卫城,城里及四周相近地区是当时天津主要居民区。北面的太平街,西接西大湾子,东经针市街,可达北大关,估衣街,河北大街,都是当时的商业繁盛地区。在上述这些地区里有许多世代书香,读书人家。民间热心兴办近代教育事业的领军人物——严修(范孙)的住宅就和书院近在尺呎,后来办起著名的严馆(严氏家

塾)直到敬业中学都没离开这里。著名天津方志学家,对天津地方历史研究作出很大贡献的高凌雯(彤皆),天津近代第一书法家华世奎(璧臣)住家都离书院不远。诸多好读书治学的人家带起了这一地带兴盛的学风。

综合这一节的记述,可以明显看到,在清代,稽古书院一带地方文风很盛,学风很盛,有很深厚的文化底蕴。

## 第二节 天津市第一所官立中学堂的创建

### 一、书院改学堂的酝酿

列强的坚船利炮惊醒了爱国人士,变法维新催生了我国的近代教育事业。光绪二十一年(1895)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,民族危机严重,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利益的康有为等人,以变法图强为号召,掀起变法维新运动,上书光绪皇帝。光绪二十四年(1898)四月光绪接受变法主张,下诏定国是。从四月到七月陆续颁布了一系列的维新法令,推行新政。明令废除以八股文取仕的制度,要各省将书院祠庙改设学堂,把兴办近代学堂,发展近代教育事业作为变法维新的最重要举措之一。六月康有为关于开办学堂之奏折提出:"远学德国,近采日本,以定学制","省会之书院为高等学堂,府州之书院为中等学堂……"。六月间光绪召见严复,询问天津开办学堂事宜。六月十七日津籍翰林院庶吉士陈骧及绅士梅振羸,陶喆生等奏请在天津就地筹款建立学堂。八月初六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发动政变,幽禁光绪帝,杀害

谭嗣同等六君子，康有为、梁启超逃避在外，百日维新失败。天津各书院改办学堂事未能实现，但变法兴学的思想已深入人心。

## 二、天津市第一所国人自办中学——天津普通学堂的创建

在维新思想影响下，各地有识之士继续筹建新式学堂的潮流仍然没有停止。清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），天津人民遭到八国联军的涂炭，当时天津爱国人士痛定思痛认为惩前毖后，最急迫的事情就是兴办近代教育。必须广设学堂，开通民智，来挽救垂危的国家。而且天津人由于躲避战乱而外迁的接连归来，青年学子也没有就学的地方。当年冬天，天津地方绅士高凌雯（彤皆）、王世芸（小铁）、林兆翰（墨青）、王春嬴（寅皆）高凌霁（泽畲）等商议，就稽古书院原址改设学堂，公推高凌雯、王世芸办理有关事宜。当时天津地方行政大权操在八国联军设立的都统衙门手中，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）初，经过和都统衙门总文案美国人丁家立商洽，允许备案，取名天津普通学堂，于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十九日（1901.3.9）成立，三月开学。高凌雯、王世芸为董事。美国人格林担任英文总教习。高凌雯（1861 - 1945），字彤皆，天津人，光绪十九年（1893）举人。曾任国子监后补博士、学部普通司主事。是天津三中的主要创始人。后致力于天津文史、方志工作。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博览有关天津的典籍资料，解决了大量疑难问题，修成《天津县新志》28卷，是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，最后一部完整正式的志书。他的著述



还有《志余随笔》、《毡椎记》、《天津士族科名谱》、《一瓶录》、《天津文汇》、《天津诗人小集》、《刚训斋诗集》、《刚训斋文集》等。

天津普通学堂是天津市第一所由国人自办的中学堂,在全国也居前列。

### 三、初创时期概况

普通学堂规定学制为4年,学习期满考试合格者毕业。最初招生两班,学生98人。由于陆续前来就学的学生日益增多,扩大为3个班,后又增到4个班,共有学生一百几十人。除格林外,又先后聘请汉文教员、本国人英文教员各4人,按班授课。

当时清政府还没有办学章程可循,学堂就应设的功课,择要讲授。上午学英文,下午习汉文。英文以《华英初阶》、《英文法程》为课本,国文由教员选择适宜的古文讲授。算学、物理、世界历史、亚洲地理、世界地理等课程,采用英文课本讲授,中国历史用中文教材《通鉴辑览》,地理课本有中文《东亚三国地志》。各班体操课由英文教员担任。每日上下午各上课三小时,每月考试一次。这些课程设置基本上已达到了近代中学教育的要求。

每个学生每月缴纳学费3元,经费不足时用旧书院地租和存款息金补充,住宿生膳费自付,教员按月给薪,格林只收车费,不收薪金。高凌雯、王世芸都不支薪金,也没有车费。

普通学堂创立时由于原稽古书院房地空闲,房舍齐备,稍加修缮,就能使用。将大小房舍20多间开辟为教

室、教员预备室、学生休息室等,还开辟了一个篮球场。

普通学堂的办学效果是好的,有不少的高材生,在事业上卓有成就,成为著名人物或知名人士。如首届学生冯熙敏(叔捷),1904年考入北洋大学堂,毕业后经朝廷考试名列第一,钦点翰林,官授翰林院编修、国史馆协修。后任留学生学成回国朝廷会试的主考,1913年到北洋大学执教,专心治学,潜心培养学生,桃李满天下;中国科学院院士,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,宝钢副首席顾问,冶金专家周志宏博士,中国科学院院士,北京前钢铁学院副院长冶金专家魏寿昆博士,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冶金专家王之玺,中国科学院院士、清华大学副校长、深圳大学校长张维博士,中国科学院院士、邮电学院院长叶培大教授,中国科学院院士,天津大学校长史绍熙博士都曾受业于冯熙敏先生,对冯熙敏先生的高尚品质,高深学问,高超的教学方法都怀着深切的敬佩之心。在1986年7月30日冯熙敏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时刊印的《冯叔捷教授纪念论文集》里,有近百位国内外知名学者题辞、赋诗、撰文纪念。缅怀冯先生一生刻苦治学,勤奋执教,热爱教育,热爱祖国的崇高品德和教育业绩。再如首届学生赵天麟(君达)于1904年在普通学堂毕业考入北洋大学堂,1906年由北洋大学堂第一批派往美国留学,毕业于哈佛大学,获法律博士学位,并被授予哈佛大学金钥匙一枚,回国后曾任北洋大学校长,创"实事求是"校训,至今奉行已达88年。1920年转任开滦矿物局协理、1931年任天津耀华中学校长。曾积极参加天津人民反对法国强占老西开的斗

争,当选维持国权国土会副会长与晋京请愿代表,日本侵占天津时利用耀华中学地处英租界的有利条件,抵制奴化教育,支持学生抗日运动,不幸1938年6月被日本特务刺杀,成为烈士。

天津普通学堂办得成功,为本身今后的发展和全天津的中等教育事业开了个好头。在尚无章可循下,取得良好效果,难能可贵。如果要深究普通学堂为什么能成功?不外乎1、领导人受外国侵华战争的震动,痛下兴办新式教育、培养救国人才的决心,不计有无报酬,不辞辛劳,竭尽自己的才智,全力推进这所学堂的工作。2、聘请的教师具备所需才识,悉心教学,克尽职责。3、足够的房舍及一切必需的设备及相应的经济能力。4、学堂原址铃铛阁的极高知名度和当地深厚的文化底蕴,浓厚的好学氛围以及各方面的支持也都是有利条件。

### 第三节 官立中学堂的诞生

清光绪二十八年(1902),清政府与八国联军签订和议,占领天津的外国军队撤出,当年七月(1902.8)天津地方官署恢复。这时正值直隶省兴办学务,各府州应设立中学。当年冬天,经过地方人士与官府协商,认定普通学堂首届学生具有中学程度,以官办为宜,因此确定在光绪二十九年(1903)春移交天津知府衙门,改为官办,更名为官立中学堂,由天津府知府凌福彭(润台)兼任总办,汪开祉为会办,夏冕(姒旒)任监督,其职责等于后来的校长。

凌福彭,清光绪己未科进士,历任户部主事兼军机章京,1901年任天津府知府;夏冕为候补道台。官立中学堂是天津的第一所官立中学。

官立中学堂首期招生55名,于清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廿四日(1903.2.21)开学,经费由天津府所属7县田房契税项下拨给,由各县直接解交学校,约银6千余两。学生每人每月交纳学费大洋1元。

此后几十年,官立中学堂的校名经历多次改变,但民间仍经常用“官立中”的名称称呼这所学校,名气很大。

## 第二章 经历辛亥革命， 顺利发展壮大

(1903.2 ~ 1923.1)

### 第一节 逐步发展扩大，渐具规模

#### 一、校名、领导人次第变更，规模逐渐扩充

清光绪二十九年(1903)改为官立中学堂后，光绪三十年(1904)监督夏冕参加会试，由管凤和(洛笙)代理监督，不再设立总办和会办。管凤和曾为北洋常备军兵备处文案，后任奉天新民府知府。同年六月，改由刚从日本宏文书院毕业归国的中国首批10名留学生之一的胡家琪(玉荪)接任监督。光绪三十一年(1905)五月胡家琪转任他职，由王用熊(梦臣)接任监督。王用熊以为官立的名义名实不符，当年改名为天津府中学堂，监督改称堂长，王用熊为堂长。

辛亥革命后，1913年天津府中学堂归属直隶省，改为省立天津中学堂，堂长王用熊。1916年又改名为直隶省立第一中学校，校长仍为王用熊，是第一任校长。

光绪三十三年(1907)省令经费由天津县公署支领,学生不交学费,书籍、制服、食宿都由学校供给,月考有奖金,学校全年经费支出约2万元。1912年起略收学费,书籍、制服等由学生自备。后历年增班,每增加1班,增拨经费大洋200元,1914年每月经费大洋1800元,到1918年年经费为2.9万余元(另一记载为2.2万元)。学费逐渐增加,到1921年学费每年24元,分两次交纳。校友会费每学期1元,在校住宿每半年6元,在校外太阳宫宿舍住宿每半年3元。

光绪二十九年(1903)有学生4个班,光绪三十年(1904)仍为4个班,学生约200人。1911年学生322人,1913年有8个班,学生约400人,1916年学生613人,1920年学生630人,投考学生多来自天津府7县,也有来自山东及其他各省的。录取学生多数为经营工商业或农村田产较多和有功名人士的子弟。

从光绪三十四年(1908)起至1921年毕业生共14届,合计636人,其中商科毕业生两届35人。学生毕业后多升入高等学校,如北洋大学、高等工业学校等。家境稍差的多就业于海关、邮政、铁路、洋行、开滦矿务局和政府机关等。后来国立、私立、教会大学渐多,升入大学的比例也渐增,由于学生基础好,英文程度高,又适应天津工商业城市需要设有商科,各行业求职的录用率很高。

从光绪二十八年(1902)起陆续修建和改建校舍,较大规模的修建工程有:光绪二十八年(1902)添设藏书楼5间,西寝室9间,东寝室6间,饭厅4间,饮茶室7间,共计

31间,光绪三十年(1904)增筑东房12间,三十二年(1906)建大楼5间,光绪三十四年(1908)改建北楼两层11间,建后院讲堂6间,宣统元年(1909)改建东楼两层17间,宣统三年(1911)增建中楼13间,其中教室上下两层共6间,并开辟西头太阳宫房舍为学生校外寄宿舍,1916年改建礼堂1座,两边教室两层共4间,改建西楼7间,改建南楼11间为学生宿舍,西南角改建楼房6间为校长办公室及住室,至此,校舍建设已具规模。

## 二、办学宗旨的演变

清光绪三十二年(1906)规定教育宗旨为忠君、尊孔、尚公、尚武、尚实,并把忠君和尊孔放在最重要的地位。所谓尚公是指热爱大清帝国;尚武是学习操练;尚实指崇尚实业。学校据此提出对学生施行较深的普通教育,使学生毕业后从事各项实业或升入高等学堂均有根底。

辛亥革命后,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要求中学校以完足的普通教育,造就健全国民为宗旨,但北洋军阀大力推行复古主义教育,提出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的大本,直隶督军褚玉璞下令读经,学校把读经编入课程。直至1916年,北洋政府教育部提出"养成社会人格,发展共和精神"的教育宗旨,成为学校办学的遵循。

## 第二节 打下办学的良好基础

### 一、奠定教学工作的基本格局

## 1. 学制和课程

1903 ~ 1913 年为五年制,自二年级以上分为文科和实科,后均改为普通学级。1914 年起为四年制,并办有特别班,为预备投考大学开设,1916 年夏在四年制的第三年分为普通科和商科,普通科以升入高等学校为目标,商科侧重于满足社会就业的需要。1917 年 9 月添设商科及簿记打字两班,招收四年级无力升学者,便于求职。

清代,从官立中学堂起,均按学部教令设置课程,有修身、读经、国文、英语、历史、地理、算学、博物、物理、化学、法制、理财、图画、体操等课程,周课时 36 小时,其中读经每周 9 课时,英语一至三学年每周 8 课时,四、五学年每周 6 课时,修身课摘讲五种遗规、包括养正遗规、训俗遗规、教子遗规、从政遗规和在官法戒录,经学教材以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周礼》为必读,国文选讲经史子集及近人文集,以《御选古文渊鉴》为课本。清代国文"首讲文义,务期熟读",作文每周 1 ~ 2 次,兼学各种文体,算学先学算术,依次为几何、代数、三角,讲到立体几何初步及平面三角为止。民国时期课程依照教育部法令设置,有修身、国文、外国语、数学、历史、地理、博物、物理、化学、法制、经济、图画、手工、乐歌、体操等,取消了读经,但在修身课程充满旧思想,国文课里也常有封建色彩。外国语为英文。到了 1921 年 9 月一二年级国文才改为语体文。商科的课程有修身、国文、外国语、经济、簿记、打字、体操等。王用熊任期内,增添兵操,还在每日第二时下课后由教员教授柔软体操。



## 2. 师资状况

清宣统元年(1909)学校有教员 20 人,其中大学毕业 4 人(北京大学 2 人,北洋大学 2 人),水师学堂毕业 3 人,外国人 3 人(美籍 2 人、日籍 1 人),其余 10 人为贡生、附生、进士、举人、五品军功等,到 1921 年师资队伍变化很大,1921 年 6 月教职员学历统计如下:

	国外大学	师范大学	大学	专科	其它(其中本校毕业)	总计
教职员	2 5%	3 7.5%	8 20%	16 40%	11(4) 27.5%	40
专兼职教员	2 6.1%	3 9.1%	7 21.2%	13 39.4%	8(3) 24.2%	33

教员中大学毕业占 36.4%,专科毕业占 39.4%,合计为 75.8%。

校长王用熊(梦臣)为北洋水师学堂毕业(一说育才馆毕业),兼教务部主任,闫鸿业为日本弘文学校毕业,训育部主任兼国文、修身教员。数学教员邢耀章为北洋大学毕业、张辅廷为北京高等师范肄业,英文教员侯绍孔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、汪如皋、陈永寿、金曼倩分别为天津新学书院大学语文科、工科毕业,理化教员刘季夫为高等工业学校毕业、王宗鲁为直隶公立专门学校毕业,图画教员李康侯为北京大学博物科毕业,国文教员多为清末科举出身,如董麟士、蔡晴轩、高星彩等。另先后有美国教员 10 人、日本教员 2 人曾在学校任教英文、化学、手工、体操等科。

王用熊任校长期间,极为重视师资质量,所聘教师均有专长,注意资历、品行,校内师资人才荟萃,严谨治学,